

讀「巨流河」有感

· 葉文欽 ·

前言

「巨流河」是一部因日本入侵，促使「齊家人」由東北瀋陽鐵嶺老家，輾轉南遷，又進入抗戰大後方四川，接著經過國共內戰，導致兩百萬左右的軍政人員及百姓，再度轉進臺灣的故事。作者齊邦媛教授從八十歲開始，自己在長庚養生村內，靜靜地花了四年的時光，一筆一筆地完成回顧國家苦難、涉及全民動蕩、有著時代記憶的報導文學巨著，也是一部很成

功描述由「巨流河到啞口海」，兩代家族間的記憶文學，巨流河指的是我國第七大河東北的遼河、啞口海則是臺灣墾丁南端的岸邊海域。本書出版之後，很快就在大陸出了簡體字版，在海峽兩岸均引起熱烈反應，廣大共鳴的聲音，由作者再結集成為「洄瀾：相逢巨流河」。

東北與臺灣

從臺北的館前路進二二八紀念公園「國立臺灣博物館」，走入大門會看到左右有兩隻臥著的銅牛，這是東北「滿州國外交部長」謝介石，代表送給日據「臺灣始政四十週年」的禮物，謝介石是臺灣新竹人，滿州國的執政（原清朝末代宣統皇帝）溥儀的御醫，是現臺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的父親，也是臺灣人。「東北與臺灣」這相距遙遠的兩個地方，原來都是大清帝國（中國）的領土，但因日本的介入，不但中國政府有一度對他們沒有管轄權，還成為日本帝國主義者，對外侵略擴張的前進基地，一指向中

國本土、一向著東南亞。

「東北」是入主中原滿州人的興隆之地，進入山海關之後的大清帝國，嚴格控制人口過多的關內居民，不得移民到空空蕩蕩的滿州地區從事開墾；但不斷往東發展的俄羅斯人，則一步步的入侵，終於取得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土地；到一八七〇年左右，清政府這才開放漢人進入東北，但為時已晚矣！

日本原來也是鎖國政策，一八五三至五四年間，美國培利黑艦隊扣關成功，導致日本猛然甦醒，要「脫亞入歐、全盤西化」，並也以為擴張的帝國主義為師，向西南將目光指向臺灣，因為他們認為收復臺灣的鄭成功，也有一半日本的血統，一八七四年就以「牡丹社事件」為由，入侵恆春地區，最後導致琉球王國先脫離其原宗主國，被納為日本領土改名沖繩縣；向西則以朝鮮為跳板，將目光及武力經過朝鮮半島，投射向我國東三省的滿州地區，和俄羅斯在中華大地上爭奪「土地和資源」。

再經過二十年的一八九四（甲午）年，以東林黨事件為由，在雙方都出兵的情況下，黃海海戰將李鴻章辛辛苦苦建立的「北海艦隊」殲滅，「馬關條約」除使朝鮮脫離中國受日本



巨流河圖。

統治，並割讓「臺灣和遼東半島」，我們艦隊被毀了，還得要賠償「戰勝國」軍費兩萬萬兩白銀；後來在列強多國的強烈干預下，清政府再花三千萬兩白銀，贖回遼東半島，但俄羅斯的勢力借此進入，導致一九〇五年日、俄在我國領土境內的大戰，悲哀的清政府只能「置身事外」，最後在美國調解下所簽訂的和約，是拿中國東三省的土地，被瓜分成北滿（俄羅斯）、南滿（日本）的勢力範圍，從此日本在瀋陽建立起「關東軍」總部，除防俄外更將真正侵略的目標，投向中國本土，欲建立其所謂「大東亞共榮圈」。

「辛亥革命」成功之後，中華民國雖成立，但政權並未統一反而是軍閥割據，其中東北是張作霖所控制，一度還入關成為北洋政府的執政。因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勢如破竹的北上，張作霖為保存實力，於退出山海關時被日本人炸死，其長子張學良繼承後，宣布東北易旗，又經過中原大戰，張學良又宣布支持中央，這才有中華民國政府形式上的統一，開啓往後十年（一九二八—一九三七年）的黃金建設。

此時「中國共產黨」已建立，經過跨黨發展、又經過清黨的分裂，中

共也確立以「武裝奪取政權」的戰略方針。民國二十（一九三一）年關東軍發動「九一八事變」，整個東三省完全被日本掌握，成立傀儡政權「滿洲國」。再經過「七七盧溝橋事變」，抗戰全面爆發，接續「歐戰、太平洋戰爭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，蘇聯借著美國投下「原子彈」之際，才對日本宣戰，主要搶奪我國東三省的資源，戰後東北成為蘇聯的受降區，共軍林彪部隊進入東北後，擴張成「四野」達百萬之眾，這才是國共四年內戰結果的關鍵。八年抗戰雖收復臺灣，朝鮮獨立也分裂為南、北韓，但琉球群島並沒獨立或自治，一九七五年美國於歸還代管統治權時，「刻意」將釣魚臺列島納入，為往後中、日、臺三方「預留」了模糊地帶，更產生了衝突空間，這就是國際現實。

齊父在抗戰的角色

「巨流河」講述的主角之一，就是作者的父親立法委員齊世英，齊家是來自山西太原府的漢人，定居於遼寧省鐵嶺縣。齊世英曾留學日本、德國，回國後主要在北方「組織領導地下抗日工作」。大家都知道「西安事變」改變了中國的歷史；在軍閥割據時代，更早在東北也有發生「郭松齡

事件」，參與過兩次的「直奉戰役」，這位東北軍著名的將領，恨透了這種傷亡慘重的內戰，因此於第二次「直奉戰役」入關時，民國十四（一九二五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在河北灤州通電：「請張作霖停戰下野，將軍政權交給張學良」，發動兵變後回師東北，但其部隊未能渡過遼（巨流）河而失敗，郭松齡被奉命「就地槍決」。齊世英參與這次的兵變後，出逃到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，尋求「政治庇護」，再輾轉經朝鮮的釜山、日本，才回到天津，因此與當時駐審陽的總領事、日本戰後的第一任首相吉田茂（一八七八—一九六七年）之間，建立起私人間良好的情誼。

齊世英交往的對象很廣，最大的興趣是從事「教育」，一九二三年由德國返鄉，最早的工作就是出任「同澤中學」的校長，這是郭松齡和張學良為「教育軍人遺族子女，以盡袍澤之情」，所籌備的一所中學（接賴名湯為參謀總長的宋長志，就是就讀這所中學），但一年後他就參與了郭松齡的兵變。一九二六年底在上海加入國民黨，在抗戰爆發之前，他曾以陸軍中尉身份，進入日本步兵學校進修，對於「日本覬覦東北」的真心表白，內心深為故鄉而感到憂慮。「九一

八事變」之後，東北已入日本的全控

之中，有志之士紛紛內遷。齊世英先秘密進入東北，發展抗日義勇軍的工作；而他們全家也輾轉內遷以求安全，齊邦媛（出生於一九二四年）對這段流亡大家庭的童年往事，有很詳盡的描述。齊世英再回到關內之後，在政府的支持下，做了很多安置照顧入關東北鄉親的事，雖也辦雜誌維繫鄉情，其中影響較為深遠的是，先在北平成立「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」，再度投入他熱愛的教育工作，民國二十三（一九三四）年在北平成立「國立中山中學」，收容約兩千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學生，這是中國第一所國立中學。抗戰爆發後，這所中學也輾轉內遷，並沿途也招收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各地數百名的中學生，很多畢業生後來均投入軍政文化界的工作。齊世英的家人，長時間也起了照顧東北流亡學生的責任，其中包括後來投考空軍官校的張大飛。抗戰勝利回鄉「學校」反而遭停辦，在四十六年後，一九九四年時「中山中學」在瀋陽復校重見天日，這是當年流亡返鄉及海外的老校友們所促成的；二〇〇一年在「九一八事變」七十週年之際，齊邦媛兄妹四人一起返回瀋陽，向東北的中山中學，捐獻了「齊世英紀念圖書館」。

念圖書館」。

抗戰勝利後，齊世英成了立法委員。四年內戰之所以會失敗，東北是關鍵，蘇聯在美軍投下原子彈後才對日宣戰，十三天後，日本的關東軍近六十萬人，在哈爾濱向蘇軍投降，遠在西南方的中央政府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共軍進入東北；加上後來中央政府派往東北接收者「用人失當」，不能體恤東北人多年的受辱痛苦，國史館「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」對此有所分析，並導致「共軍發展達百萬之衆，林彪在遼瀋會戰後，四野一路南下，並解放了海南島」。齊世英只好舉家又轉進來到臺灣，但他因與中央不是很融洽，對「戒嚴體制」有所批評，一九五四年這位「中央委員」就被開除出國民黨，一九六〇年的「雷震事件」差一點被波及，所以齊邦媛教授特別寫下「永恆漂流的父親」。齊世英後來在臺灣曾遇到過張學良；曾任國防部副部長的康寧祥回憶，當時他係增額立委的身份，齊老對他的協助、使他能瞭解立法院生態及問政方式，表示感念不已！在大陸時期，蔣委員長初見齊世英時，認為他不像北方人，但齊世英確實是一位鐵錚錚的漢子；雖一生為東北付出一切，但最終（一九八七年）只能在三芝鄉遙望，再也回不去了！

學習與教學

，再也回不去了！

「巨流河」更重要是作者齊邦媛教授的一生回顧，她有來自漢、滿、蒙的血統。由於父親的關係和勸導，要求應做好份內的事，學生就是要好好地把書讀好，故她對於抗戰內戰的「愛國活動」，能保持冷靜從不狂熱。抗戰流亡動蕩的環境中，作為從初中到大學的學習階段，她就讀的兩所學校是「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」。南開家族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所創，張伯苓原留學英國學習海軍，甲午海戰讓他徹底失望，「船堅砲利」不是強國的因素，其根本在教育。所以張伯苓再度到美國學習，回國後在天津創辦私立的「南開教育體系」，從小就要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，南開教育出來的名人很多，如中央研究院的吳大猷院長、中共的總理周恩來等。

由於洞悉日本人的野心，張伯苓很早就在重慶購地，故抗戰爆發後，南開中學順利在重慶復校，南開大學則和北大、清華，在雲南昆明合組成「西南聯合大學」，齊邦媛的中學教育就很完整地在南開中學學習。民國三十二（一九四三）年畢業後，順利考上遷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哲學系，

但受到我國著名的美學大師朱光潛教授之賞識和規勸，大二轉讀外文系。也因緣際會地在大陸國共內戰尚未全面如火如荼之際，因地質學家馬廷英教授（代理臺大理學院院長），回大陸找師資的關係，齊邦媛正好畢業就應聘於民國三十六年十月，搭螺旋槳飛機來臺，擔任臺灣大學外文系助教，展開往後在臺一輩子的教學與推動臺灣文學的重責大任。

或許是緣份，她認識早期來臺也是武漢大學校友，當時在鐵路局工作的電機系學長羅裕昌，第二年他們就回大陸結婚，再一起回到臺灣；這時大陸內戰已火熱，國府有撤臺打算，其中空軍的行動已展開中。民國三十九（一九五〇）年因先生工作的關係，舉家搬遷到臺中居住了十七年，三個兒子都在那裡出生。民國四十二（一九五三）年再開始到臺中一中教英文，這期間很重要的一件大事，是考取美國國務院（傅爾布萊特）文化交流計畫，民國四十七（一九五八）年改到省立農學院（現國立中興大學）任講師，並兼教於靜宜文理學院（美國文學）、東海大學（外文翻譯），特別是兼國立故宮博物院（北溝時期）的英文秘書（一九五九—一九六五年）。

民國五十六（一九六七）年隨先生調職再遷回臺北，並兩度考取傅爾布萊特交換學者計畫，到美國印第安納州一所學院教「中國現代文學」，也在印地安納大學進修「比較文學」；民國五十八（一九六九）年回國，在中興大學新成立「外文系」兼系主任（三年）。民國五十九（一九七〇）年又開始在臺大外文系兼教，到民國六十六（一九七七）年才正式轉為專職，這期間常代表出國開會、擔任國外訪問的客座教授，並與大陸有關文學人士有所互動，在民國七十七（一九八八）年由臺大外文系退休，第二年，臺大特別頒贈齊邦媛為「名譽教授」。

推動臺灣文學與課程改革

個人對齊教授最深刻的印象，是她努力地將「臺灣文學」推向世界。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，但現在有關於談到「中國、臺灣」，已變成很敏感的政治話題，這是因為政治人物的「政治目標」不同，故意炒作所導致。文學是有地域性也有其特色，會自然的發生，齊教授認為：「自從有記載以來，凡是在臺灣寫的，寫臺灣的人和事的文學作品，甚至敘述臺灣的神話和傳說，都是臺灣文學。世代居

住臺灣的作家寫的當然是臺灣文學；中國歷史大斷裂時代，漂流來臺灣的遺民和移民，思歸鄉愁之作也是臺灣文學。」我手頭有兩本書，林海音的「城南舊事」和白先勇的「臺北人」，就是齊教授推動工作的典型代表作之二；一本是臺灣人回憶描寫她居住北平時所發生的事，一本是外省人在臺灣創作有關在大陸或來臺的回顧，這兩本書的內容篇章，還被改編為膾炙人口的多部電影廣為流傳。

歷史學家將明朝萬歷年間（一六〇三年）陳第「東番記」，認為是臺灣信史的開始；而來自浙江的沈文光（一六一二—一六八八年），明亡之後漂泊海上，因遇颱風漂流到臺灣並終老於此，經歷荷蘭、明鄭三代及清朝的統一，於康熙二十四（一六八五）年，與渡海來臺文士官員組第一個「東吟詩社」，被稱為是「臺灣文學」的肇始。

到民國三十八（一九四九）年兩百萬軍民播遷來臺，距沈文光來臺已近三百年，這些來自中國各地的軍民，各有難以割捨傷心的往事，這一龐大的鄉愁隊伍，是臺灣文學重要的內涵之一，近（二〇〇四）年，齊教授和王德威一起主編的「最後的黃埔：老兵與離散的故事」一書，民國九十

四（二〇〇五）年臺大邀請教授，主講「我對臺灣文學與臺灣文學研究的看法」，出版DVD片；齊教授催促推動要成立國立文學館，經立法院改名為「國立臺灣文學館」，民國九十二年（二〇〇五）年也正式在臺南設立；凡此均為齊教授心願之完成。促使齊教授投入並得以完成心願的動力，和她多次獲傅爾布萊特文化交流計畫，到國外學習講學及外國人提問題的內容、也常代表我國出席國際筆會（International PEN）年會，向世界各國介紹我國文學概況和成就有關。國際筆會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，PEN是Poet、Essayist、Novelist二個字的簡寫，從事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、作家互訪、作品互譯的工作；民國十三（一九二四）年我國的筆會在上海成立並加入總會，發起人有林語堂、胡適、徐志摩……等人，會長為蔡元培；二戰期間因各國介入戰爭、立場對立，國際間「文學交流」一度停止；民國四十二（一九五三）年筆會在臺復會，一九五九年再回歸國際筆會，林語堂於一九七〇年當選為會長，當年在臺北剛落成的圓山飯店，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，非常成功大大地提高臺灣的聲譽。

林語堂認為「臺灣應該有一份發

表作品的英文刊物，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。」民國六十一（一九七二）年中華民國筆會季刊（Chinese PEN Quarterly）正式創刊，齊教授和殷張蘭熙女士（大陸工程公司殷之浩夫人）對這本雜誌投入相當多的心血，發行至今從未脫期，是國際筆會間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，臺灣文學就靠這本季刊向國際發聲、推介出去，除雜誌的出刊還有很多與國外（大學出版社）合作的專書出版。而現在國內各大學，從事臺灣文學教育與研究的教授和學者，幾乎都是齊教授的學生，或學生的學生。

從民國五十七（一九六八）年起，要實施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」，那時所有教科書都只有部定本一種，教科書有三年暫用本的緩衝期；民國六十一（一九七二）年，齊邦媛接了「國立編譯館」教科書組組長一職，編譯館所遇最大的困難，就是要新編出國民中學第一套「部定本」教科書的問題，當時大家最有意見但無人敢直說，就是「國文暫用本」的教材，太多黨、政、軍的文章。要編出新國文教材不只是「學術判斷」、也是「政治判斷」的大事，這面臨的「革新挑戰」有多強烈巨大啊！她請出臺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（一九〇七—一九七

九年）先生，為全新的「國文編審委員會」主任委員，屈先生曾任中央圖書館館長、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，後又選上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學術聲望很高。

為獲各階層的支持，齊教授帶著「新舊國文課本目錄」，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、黃季陸，武漢大學校長、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，尋求了解和支持，希望大老們在「輿論風暴」之前，能對編審委員會的「改革具有同理心」、「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」的理想，黃部長表示他很贊成「政治退出語文教材」；當然改革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在麗水街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家，齊邦媛將第一版六冊的「國中國文教科書」和英文本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」，放在書架最尊貴的地方，代表教授來臺六十多年在教育領域最大的付出。

與空軍的情感

「巨流河」最為人感興趣的章節，可能是寫到空軍官校第十二期畢業，抗戰為國犧牲的張大飛；國內果然有人願拍成電影，但齊教授表示在她有生之年絕不贊成，因為可能會改編的「走樣八卦」，會褻瀆一位青年純潔愛國的心。張大飛原名張迺昌，父

親是「滿洲國」成立之初，瀋陽的縣警察局局長，因接濟又放走不少地下抗日志士，被日本人用油漆活活燒死，一家八口四散逃亡，他信奉了基督教，並隻身進關，考取「國立中山中學」初中三年級，這才有安身之所。齊世英要他兒子去將張迺昌找出來並帶回家，受到齊家的照顧和安慰，成為齊邦媛心目中永遠的四哥。民國二十六（一九三七）年改名報考空軍官校的張大飛，在趕到碼頭報到之前，特別先到醫院探望重病的齊媽媽，並送了一本他自己擁有一模一樣的「聖經」給邦媛妹妹。往後八年的書信往來，是抗戰期間（南開學習及戰鬥生涯），大家彼此最大的心靈及精神的慰藉。

民國三十四（一九四五）年，抗戰進入最後階段，六月初齊邦媛收到哥哥的來信：「張大飛在五月十八日豫南會戰時掩護友機，殉職於河南信陽上空。」或許人真有預感，兩個月前在十四航空隊「中美混合聯隊：CACW」的張大飛，將一包信件託給修護的周先生，「若有一天他上去了回不來，請按址寄給她（齊邦媛）」。「齊家是戰時通信地址之一，這是一大八年來齊妹妹寫給他的信，另一封給她哥哥（齊振一）的訣別信，

是一位二十六歲年輕人「與他有限的往事告別」的信，信中表示「只能是兄妹之情，否則會害她。」可是八年來的成長與書信的往來，他是說出了心意，但他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」。這是多年間往來的信件，有一個少女在殘酷戰爭中成長的心路歷程，及一位青年由流離困境投身最強烈戰鬥的完整自述。與此同時發生的事，是對我國抗戰最有功勳的陳納德將軍，被迫辭去十四航空隊司令的消息，震驚了中國的朝野。

民國八十八（一九九九）年四月，齊邦媛至北京參加「南開中學」班友五十年後的首次重聚；五月初赴南京紫金山麓「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」，這裡有七百多位外國人，三千多位中國空軍烈士的名字，在編號M的黑色大理石碑，找到「張大飛 上尉 遼寧營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職」，齊邦媛在列名的碑前合影留念；和民國三十五（一九四六）年，無意間看到並參加張大飛殉職一週年的紀念禮拜，這並不全是一個意外？

民國才女嫁給梁思成的林微因，有一著名的叔叔林覺民，她的父親林長民和齊世英一樣，都參加了郭松齡的兵變，不幸被流彈所傷「死了」；

抗戰爆發林微因一家人內遷，曾與八位空軍學員認識並建立友誼，因此年輕飛行員的父母都在淪陷區，因此他們都將梁家當成自己的家，而梁氏夫婦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小弟看待照顧，不幸往後幾年，這八位飛行員一個個在戰鬥中都為國犧牲了。

而林微因有一位同父異母的親弟弟林恒，民國二十九（一九四〇）年春，以第二名自空軍官校畢業，民國三十（一九四一）年三月十四日，林恒在成都上空的空戰中就為國捐軀。盡管在病痛中，林微因也只能勇敢地面對這悲慘的訊息，三年後她寫了「哭三弟恒」的詩來悼念弟弟們（參見本刊八七二期，宋孝先：才女林微因與空軍的軼事）。

回響與感想

「巨流河」出版一年就在大陸出簡體字版，兩年後日文版也出版了，將來還有英文版、韓文版。針對華人社區的所有的反應，民國一〇三（二〇一四）年初，由作者親自選編著「洄瀾：相逢巨流河」，分「評論（Reviews）、訪談（Interviews）、來函（Letters）、Anachronism（時間錯置）」四大部分，同時這些年間，齊邦媛受到各界的邀請，在很多單位團



齊邦媛老師參觀岡山空軍官校軍史館（民國99.02.23）。

體演講，發表她的親身經歷和感想。前空軍副總司令陳鴻銓老師，是張大飛空官十二期的同學，他的信中提到：「他們這一期，入伍時共兩百九十七人，經陸官、空官及赴美受訓，一九四二年畢業時才九十五位，在抗戰與國共戰爭中作戰陣亡四十七人，飛行殉職者二十人，年來均已耄耋之齡，逐漸凋零……言之不勝唏噓」。

飛行員不管作戰或平時訓練，都是比一般要危險的行業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前政戰部潘

恭孝主任，曾代表空軍致函齊老師，表達敬意並「邀請老師撥冗前往岡山空軍軍官學校的空軍軍史館參觀。」，約兩年前，經時任官校田校長的聯繫，齊教授即有「捐贈張大飛烈士遺物的想法」，在前空軍副總長馮世寬老師、妹妹齊寧媛女士等人的陪同下，齊教授親蒞空軍司令部，受到當時空軍劉震武司令（現已接任國防部副部長）的熱誠接待，齊教授參觀部史館後，並捐贈「張大飛烈士遺物（聖經、照片）」，期藉由空軍妥善的保存與陳展，將抗戰時期青年「中國不亡，有我！」的精神志氣，傳承給新世代的年輕人（見本刊八八七期）。

「巨流河」是一部結合國家災難變遷大時代的家族史，當齊邦媛再度回大陸，見到「南開中學、武漢大學」的同學們，當年反政府所謂「進步的同學」，在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後，他（她）們不但沒有雞犬升天，很多人反而受到很大的迫害，大家對她來臺的成就，都表示非常地欽羨；更值得慶幸的，這本書很快就在大陸出了「簡體字」版，讓大陸同胞瞭解不一樣的真相。

同樣寫家族三代史張戎的「鴻」一書，二十多年後在臺灣再版了，但卻一直無法在大陸出版，對她共產黨

的父母，一生參與革命得到的慘痛回饋、及她本人在文革時期所受的迫害，這「真象」使得這本書無法與大陸讀者結緣。

「葉家：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」，這是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（Joseph W. Eschick）所撰寫，從晚清到民國、再到共和國階段，十九至二十世紀兩百年間的國情變化，描述在時代洪流中一個家庭的命運沉浮，如同在抗戰期間，越是支持共產黨的家庭成員，到解放後歷經反右、文化大革命等過程，反而成為最為嚴重的受害者。這家族有些人，一關就是十八年，到一九七五年，共產黨宣布「全部在押的國民黨團級以上軍警憲特人員」特赦時，才一併被釋放，對於當年反國民黨最深，翻譯「達爾文全集」權威的葉篤莊來說，實在是十分諷刺；怪不得其臨終時對前往探視的弟弟們，會歪歪斜斜的寫下「何罪之有？」。

近代的中國，實在可說是一個苦難的國家，戰火連年、民不聊生，老百姓多年受到海外眾列強欺凌，那麼多、那麼大的災難，我們能忘記？能不警惕嗎？期盼現居自由民主中華民國的同胞們，能記取教訓，齊心協力守護這個得之不易的寶島臺灣。